

中国才女的红尘旧梦

石白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才女的红尘旧梦 / 石白著 .—哈尔滨出版社, 2004.11

ISBN 7-80669-348-7

.中 ... 石...

书 名:中国才女的红尘旧梦

作 者:石白

开 本:16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

版 本:2004 年11 月第 1 版

2004 年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前言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男性似乎总是舞台主角，而女性则无可选择地成了他们的陪衬，在刀光剑影的朝代更迭中，女性的身影似乎仅是舒缓人们神经的调节剂。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忽略那些才华卓越的女性，她们的容貌并非光彩照人，但她们的才华却闻名于世。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经有女性所做的诗篇。此后，汉末的蔡文姬、晋代的谢道蕴、唐代的薛涛，直到宋代的李清照、朱淑贞等等可以说代不乏人。她们用自己的生花妙笔证明了女性不单单为自身的自然价值而存在。

然而，在中华民族巨匠辈出、星汉灿烂的文化史上，这样的女性实在是太少了，而且正如她们是男权社会中男性的附属物一样，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也只是正统文学的附属物。正如萧红所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单薄的……”

“五四”运动的一声春雷打破了封建社会令女性窒息的牢笼，冰心、庐隐、林徽因、张爱玲等女性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出现了，她们才华横溢，恰如枝枝红杏探出墙来，与男性作家共同构成了近代文化的满园春色。

从她们开始，女性作家的队伍逐渐扩大，到如今已经是灿若群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女性作家在都市文化意识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下迷失了自我价值，步入了创作误区。有人热衷以小女人的心态咀嚼身边的小悲喜，有人热衷与性相关联的“身体写作”，这些倾向显然背离了中国女性写作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重新提起 20 世纪上半叶的女性作家，不仅是对她们的一种纪念，而且是一种社会责任。

我们深入研究了这些女作家的生平史实和心路历程，并从中精心选择了九位最有影响，而且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写成了这本《中国才女的红尘旧梦》。

她们是——

名震上海滩，不染红尘焦火气的传奇作家张爱玲；

万水千山走遍，情遗撒哈拉的流浪者三毛；

自诩以恋爱为全部的蝴蝶，在感情上却是一片空白的苏雪林；

自比为狡兔三窟的孟尝君，灵魂却无处安置的庐隐；

萧风凄雨中苦苦挣扎，最终无奈早凋的萧红；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近代第一才女林徽因；

一双眼睛也在说话，眼光里漾起心泉秘密的陆小曼；

与波澜壮阔的 20 世纪同行，与爱同行的冰心；

乱世倾情曲径尽欢的丁玲。

她们品德与学识并重，才华与美貌同辉。正是这些才女把政治风云变幻，战争波澜壮阔的 20 世纪的天空装点得光彩夺目。她们关注女性生存的天空，寻找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因为她们的存在，我们知道了 20 世纪的上半叶不仅仅是战争与革命，20 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也不仅仅是投枪匕首。正是她们，让中国的女性开始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开始正视自己灵魂深处的呐喊，从而抛掉禁锢自己身心的裹脚布，走入社会。也正是她们，让整个社会开始正视女性的价值。

本书真实地描述了中国才女或完满或坎坷或悲凄的一生，让读者走入一个绚丽的女性世界，感觉到才女们如水般的轻盈与睿智。

细读此书，才女们的出世才华，她们的林下风姿，她们争取灵魂独立的自尊自强，对于今天的女性，今天的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启示：原来女性是可以这样活的，原来生命是可以这样张扬的。

目 录

乱世倾情曲径尽欢——丁玲

冰雪之质清婉流年——冰心

浪漫烟云此恨绵绵——陆小曼

林下风姿人间四月——林徽因

蝶舞孤绝浮生九四——苏雪林

情海逆天隐梦飘零——庐隐

凄风苦雨萧萧落红——萧红

花开花谢天涯人远——三毛

紫陌红尘一世传奇——张爱玲

乱世倾情曲径尽欢——丁玲

丁玲（1904—1986），现当代女作家。原名蒋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23年进入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引起文坛的强烈反响。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48年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出访欧美诸国。丁玲一生著作丰富，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叛逆的灵魂

秋阳落在橙黄的稻田上，清浅的小溪碰着乱石在低唱。1904年10月12日，湖南临澧农村一户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位千金小姐。她23年后叫丁玲。她出生的时候，中国漫长而腐朽的封建躯体，正逢内忧外患，人祸天灾，大厦将倾。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父亲蒋浴岚，母亲余曼贞。蒋伟这个名字是蒋浴岚取的。蒋浴岚夫妇结婚6年，一直没有儿子，在蒋伟之前，余曼贞曾经生过一个女儿，后来夭折了。蒋伟生下来时，蒋浴岚虽然满心失望，但秉承着对儿子的期望，他给女儿起了个男性化的名字——蒋伟。

蒋家一直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蒋伟的祖父做过大官，留下了值得炫耀的财产。然而，身在这样一个豪门世家，每个成员却都显得萎靡不振，整天沉迷于酒色之中。蒋伟的伯父上山当了和尚，一个叔叔做了土匪。

蒋伟的父亲蒋浴岚，聪明、慷慨、洒脱，却染上抽大烟的恶习，拿银子当铜钱花。他十几岁中秀才，又留日学法政，因身体多病，意志消沉，退学回国。在家无所事事，翻翻医书，看看病，摆弄古董，请客吃饭，刚刚三十几岁，便辗转于病榻，不久就病逝了。父亲的容貌，在3岁多的女儿的记忆中是模糊的，但他遗留的华丽的衣服、饰物以及家业，给女儿烙下了抹不去的贵公子放荡挥霍的印象。

蒋伟的母亲余曼贞，生在常德书香人家，幼年读私塾，学会了写诗作画。嫁到蒋家，从不爱管闲事，不过问家中的经济情况，对丈夫的放纵挥霍也不多说一句。她过着少奶奶悠闲而寂寞的生活，不是在房里绣花、下棋、看书，就是到花园荡秋千，消磨无聊的时光。丈夫死时，她才30岁，家中已经破产，那些上门来吊丧的差不多都是同时来讨债的债主。就在节衣缩食、想方设法还债度日的艰辛中，她又生下了一个男孩，那是蒋浴岚的遗腹子。这个孩子的降生给本已捉襟见肘的生活更增添了负担。但也因为这不幸的状况，激起了她的斗志和勇气，她抖擞起精神，在勉强担负抚养两个子女的重担之余，也试图寻找新的出路和有意义的生活。这正像丁玲在小说《母亲》中描写的那样：

在女人中，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生得并不怎么好看，却是端庄得很，又沉着，又大方，又和气，使人可亲，也使人可敬。她满肚子都是苦，一半为死去的丈夫，大半还是为怎样生活；有两个小孩子，拖着她，家产完了，伯伯叔叔都像狼一样的凶狠，爷爷们不做主，大家都在冷眼看她……靠人总不能。世界呢，又是一个势力的世界，过惯了好日子，一旦天塌下来，真受苦……

就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蒋伟的三舅突然请人送信来，告诉余曼贞，她的娘家常德县开办女子速成师范学校，定期两年毕业，问她的打算。余曼贞听后，感觉一种新的希望正降临到自己的身上，以往被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火种正被点燃，出去教书谋生正是她一直向往的事情。她立即给弟弟去了一封信，要求代她报名，然后又说服叔伯，打点行装，携着一双儿女，毅然决然地告别了伤心之地，直奔她心中的希望之地——故乡而去。

此时，蒋伟的外公已经去世，外婆尚健在，由三舅当家。蒋伟与母亲、弟弟寄住在外婆家，三舅的儿子成了她的玩伴。一次，外婆瞧着孙子、外孙女两小无猜的样子，乘兴随意说道：“长大了就让这对表兄妹亲上加亲吧。”于是，尚在懵懂之年的蒋伟就这样被订下了“终身”。余曼贞顺利地考入了常德女子师范。1911年新年刚过，学校便开学了，蒋伟也同时进入此间学校就读。余曼贞为了表示彻底放下过去的包袱，开始新生活，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胜眉，字幕唐。这样一段生活在丁玲的作品中曾有反映，她在《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收获》1980年1期）中写道：

那时我随着守寡的母亲在这里肄业。30岁的母亲在师范班，6岁的我在幼稚班。这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却轰动了县城。开学那天，学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亲穿得很素净，一件出风头的宝蓝色的薄羊皮袄和黑色百褶绸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很使我感到骄傲呢……有些亲戚族人就在背后唧唧喳喳，哪里见过，一个名门的年轻寡妇这样抛头露面！但我母亲不理这些，在家里灯下攻读，在校里广结女友。

在学校，余曼贞与后来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结为至交，她们在一起发誓：“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蒋伟称向警予做九姨。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传来的时候，蒋伟与母亲以及九姨一同经受了风暴中紧张、担心、兴奋和喜悦的心情。余曼贞还和女儿一起为一个在起义中牺牲的亲戚举哀。

辛亥革命的风暴刮到湘北，常德女师停办了。余曼贞转而考入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蒋伟也随之进入该校读小学二年级。接着弟弟也上小学了，蒋伟的母亲为他取名“宗大”。1918年，宗大患了肺炎，由于无人照顾，误了治疗，很快就夭折了。母亲痛不欲生时，蒋伟一次又一次地拂去母亲眼角的泪水，但母亲的泪水仍是潸潸而下，似乎永无休止。

蒋伟的瞎子姨妈也坐在一旁垂泪，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劝慰余曼贞，只说：“要是冰之死了也好，怎么是外甥死了呢？”这句话让当时的蒋伟怔住了。弟弟死时，蒋伟刚14岁，14岁的少女看到了多少死亡？父亲、亲友、弟弟。想到未来，她感觉一片茫然。

余曼贞只剩下相依为命的女儿，但为了孩子的未来，这年暑假，她还是亲自送女儿远赴90里外的桃源县。在这之前，蒋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那时，蒋伟的学业成绩优异，经常是门门满分，获得年级第一名，其中算术成绩最佳。她还喜欢画画、唱歌和体育，可谓是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向警予去法国后，蒋伟的母亲经常收到她从法国的来信，谈些西方世界的新思潮，还寄来一些在国外活动的照片，蒋伟因而对九姨的生活向往不已。

在学校，蒋伟的功课虽然很好，但她并不是一个只知读死书、死读书的学生。她热血沸腾地投身到“五四”浪潮中，和同学们上街游行、演讲，在贫民夜校向贫困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她们识字。蒋伟在夜校教珠算，因为年纪小，被学生称做“崽崽先生”。但蒋伟的举动无疑刺痛了守旧校长敏感的神经，当她和几十个同学毅然将辫子交给剪刀时，校方见阻止不了，只好提前放暑假将她们赶回家。

蒋伟回到常德，便与舅父母就“辫子”问题吵了一架。最后她冲舅父嚷道：“你的‘尾巴’不是也早已玩掉了吗？你既然剪发在前，我为什么不能剪发在后？”外甥女连珠炮似的一番

话，饿得舅父母只能干瞪眼睛。

这年暑假后，蒋伟转到当时比较进步的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受到国文教员、新民学会会员陈启民的影响。陈启民给学生讲都德的《最后一课》、秋瑾的诗、《今古奇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陈老师的启发下，蒋伟阅读了《新青年》、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等进步书刊。陈先生发现蒋伟写作的才能，着意培养她，鼓励她多写多看。

蒋伟第一学期就写了3本作文、5簿日记，有两首白话诗还在当时长沙的报纸上发表出来。这时蒋伟对功课有了偏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不久，周南女子中学把学生们爱戴的陈启民等先生解聘了，蒋伟愤然离开此校，转到长沙岳云中学，成为该校最早的女学生之一。

1922年春节，蒋伟应王剑虹之约准备去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学习，舅舅出面粗暴干涉，他要求蒋伟再过半年毕业后与表哥结婚。母亲却支持女儿，她认为孩子求知识，找出路，要做有学问的人，是正确的。家庭内闹了一场纠纷，蒋伟终于摆脱了包办婚约和其他纠缠，放弃即将拿到手的毕业文凭，于1922年春天来到上海。她把名字改为冰之，废姓以蔑视传统意识。她的这段经历在茅盾1933年写的《女作家丁玲》里有所描述：

大约是1921年吧，上海出现了一个平民女学，以半工半读为号召。那时候，正当“五四”运动把青年们从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唤醒了来，“父与子”的斗争在全中国各处的古老家庭里爆发，一切反抗的青年女子从“大家庭”里跑出来，抛弃了深闺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发源地”的大都市内找求她们的理想的生活来了，上海平民女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这样叛逆的青年女性。我们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学的学生。

在去上海求学之前，蒋伟随母亲回过一次蒋家。因为按照蒋家族规，有子弟出省读书，可从祠堂公费中拨谷二担补助学费。这一年，余曼贞已经在小学任教职，但微薄的薪水仅能维持低水平的生活。这一年，蒋伟17岁，已经多年没有回家了，故乡的山坳、田野、潺潺的小溪，一切在她的眼里显得分外的朦胧而又新鲜。

然而，族长用“公田里的谷，只补给男孩子，女孩子不给”搪塞了本满怀希望的余曼贞母女。余曼贞在将族长当年的借据撕毁后，带着蒋伟愤然离去，从此中断了与蒋家的最后一丝联系。在以后漂泊的日子里，蒋伟一直很讨厌别人询问故乡何处，她常常没好气地回答：“我没故乡，到处都是我的故乡。”她也讨厌别人问她姓什么。“姓什么？我没姓，我废姓了！”进入上海平民女校时，她就和几位好友宣布废除姓氏，相互间只呼名字。她们一致认为：姓氏是封建和父权的象征。但后来终于不能没有个姓，于是她找了个笔画最简单的字——“丁”。她讨厌姓蒋。她和朋友各自在字典上随意指一个字，她指的是“玲”。从这时起，她就叫丁玲。

后来平民女学遇到困难，不能按早期共产党人的理想办学，丁玲也感到失望，半年后便离开了学校，他和王剑虹到南京，两人住在一起，勤奋自学。1923年，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闯进了她们的小天地，和王剑虹恋爱，从而成了她们宿舍的常客。大家谈文学，谈社会，谈人生。共产党人瞿秋白给不满20岁的丁玲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3年夏天，丁玲和王剑虹又回到上海，进入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在文学系旁听，邓中夏任学校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科学系主任，陈望道任教务长，茅盾教小说研究。这所学校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培养过不少革命人才。

尽管进入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圈子中，但早期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还没有吸引住这位年轻才女的心。她看不惯个别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浮夸言行，所以根本就没有加入共产党的打算。她对社会、对人生充满着矛盾和苦痛，特别是两年来朝夕相处的挚友王剑虹不幸得肺病去世了，这使她更加孤独和寂寞。她多么渴望着飞向自由天地，但却没有探索到一条真正的出路。

后来经过了许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个青年人，有着一些糊涂的梦想，像瞎子摸鱼似的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结果，不能说是灰心，也实在是消沉地住在北京了。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

“莎菲女士”的传奇

1923 年暑假，在上海大学，丁玲见到了九姨，也见到了九姨的爱侣蔡和森。九姨的房间里很少有谈话声和笑声，总是静静的，丁玲知道九姨和爱人都在读书。和九姨说话时，两人的话题已经不是以前的童话故事了，而是人生道理。向警予对丁玲说：“冰之，你母亲是个有理想有毅力的人，她非常困苦，为年龄、环境所囿，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丁玲感觉到九姨话里的批评，然而她也只能在心里默默向母亲倾诉：

亲爱的妈妈，冰之在你面前是惭愧的，你含辛茹苦，吃用节俭，把钱和希望寄予远行的女儿；我南北流荡，再一次折翅而归。我多想重鼓双翅，飞越万水千山，可是，哪里是我的向往之处？哪里是我安身立命之所？哪里将成为我一生的归宿呢？

1924 年，北洋军阀之间争战愈演愈烈，白色恐怖席卷脚下这块刚刚觉醒不久的大地，许多文化人纷纷南下。这年夏天，丁玲却踏上了北去的火车。一个偶然的机，丁玲遇见了比她更贫穷的青年诗人，原是首饰铺学徒出身，但当时已是《民众文艺周刊》编辑的胡也频（胡也频，原名崇轩，幼名培基）。之后，她通过胡也频辗转认识了当时穷困的文学青年休芸芸，也即后来的著名作家沈从文。

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谊。

1925 年春天，丁玲报考艺术学校没有成功，就搬到西城通丰公寓的一个小房间里住下。她曾到一个画家私人画室里继续学习绘画，然而最终也没坚持下去。后又准备到法国寻找职业，由于母亲和朋友都持反对态度，也未成行。在这毫无希望的蛰居生活中，丁玲回想这几年来飘飘荡荡的生活，逝去的朋友，远在湘西的母亲及早亡的弟弟，无名的感伤和惆怅不禁涌上心头。她常常一人独守静思、痴坐痛哭。

就在此时，胡也频正在向她的心灵走近。当胡也频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后，就用一只纸盒装满一大把黄色的玫瑰，并在花下写着一个小小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托人送给了丁玲，表达自己的爱情。但丁玲并没有接受，而是随王剑虹的父亲回到了湖南。不过胡也频并没有放弃，他很快也追到了湖南。60 年后，丁玲在给一位日本友人的信中，回忆了当时的心境：

1925 年暑假，胡也频也到了湖南。我当时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意用恋爱或结婚来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做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

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理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当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仍应该要负一些道义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应该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自己保持自由的幻想。

1926年春，丁玲曾萌发做电影明星的梦想，即与胡也频来到上海，并进入了明星电影公司，但随后又因为种种原因退出，继而又想做戏剧演员，也终究不成。在一个个梦想接连破灭之后，丁玲把她的精力转向了文学。

1927年秋，丁玲完成了她的第一部作品《梦珂》。“梦珂”是法语“我的心”的译音。像许多作家刚开始学习写作一样，《梦珂》写的是作者自身的经历，她那段演员梦幻灭的过程占了小说四分之一的篇幅。

梦珂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纯真女学生，因为对红鼻子教员侮辱模特儿表示愤慨，不得不离开学校，在姨妈家寄住。有着新思想的梦珂想与表哥自由恋爱。可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表哥不过是一个穿西装的封建公子哥，他视恋爱为儿戏，不是自由恋爱，而是自由乱爱，把梦珂当做玩物与赌注。梦珂自由恋爱的理想破灭了，她终于离家出走。她到剧社做了一名演员，可是那里的环境更糟，她从肉体到精神都受到了更大的凌辱。就这样，一个正直纯真的青年被封建社会一口口吞噬了。作品表现出作者对女主人公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及对封建社会的强烈不满。

丁玲将《梦珂》投寄给《小说月报》，作品起先被一个编辑丢弃在废稿堆里。1927年冬，主编叶圣陶在整理旧稿时发现了它。他感觉到丁玲的文字中萌动着一种可贵的思想，同时也为她优美的文字所打动，于是将《梦珂》润色后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8卷12号上，还放在了头版的位置。

1928年春，同样是在头条位置上，又出现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整个文坛震惊了，人们惊异于一个才华出众的文学新星的横空出世。而社会知名批评家及作家则纷纷撰文予以评论，对作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对作品主人公的臧否却分歧很大。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这样开头的：

今天又刮风！天还没亮，就被风刮醒了。伙计又跑来生火炉。我知道，这是怎样都不能再睡着了的。我也知道，不起来，便会睡昏，睡在被窝里是太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

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数虽煨得多，却不定是要吃，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

故事开头就是以这样一个终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生着肺病，喜怒无常的青年女性作为开场白。小说采用日记体，主要人物有三个：莎菲、苇弟和凌吉士。苇弟是一个诚实又笨拙，善良而懦弱的男青年。凌吉士出身高贵，少年英俊，但在鹅黄软毛似的俊秀脸庞和翩翩风姿下，却藏着一个丑恶的灵魂。

茅盾曾经说过：“丁玲是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的。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作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

丁玲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1927年，当时中国流血事件处处可见，社会政局动荡，变故迭起。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通电讨蒋。18日，蒋介石自组国民党南京政府。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公开反共，然后是宁汉合流。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9月，毛泽东又发起了秋收起义……

1928年7月，丁玲与胡也频回到上海，在萨坡赛路204号摆设陈旧而雅致的新居里，他们又开始摸索和探求未来的发展之路。胡也频阅读马克思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并创作诗歌、小说和剧本。在此期间，丁玲写了短篇小说《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等，同样由叶圣陶发表在《小说月报》的头条上。不久叶圣陶来信，表示可以出一本集子了，他亲自去交涉推荐。1928年10月，开明书店出版了丁玲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丁玲解释说：“我这本集子里的主人公，都是在黑暗中追求着光明的女性，所以书名定为《在黑暗中》。”

在个人的创作获得相对丰收的同时，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组成了红黑出版社，出版了《红黑》月刊。与此同时他们还编辑了《人间》月刊，由人间书店出版。

《红黑》创刊号的“释名”反映了他们三人共同的主张：“红黑”两个字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红”和“黑”……

到了1929年，《红黑》月刊出过8期后，因为资金问题不得不停刊。为了还债，胡也频被迫去山东济南当中学教员，丁玲则继续留在上海从事写作。这段时间里，丁玲的生活相当艰苦。她从书报流通处赊来鲁迅先生编译的《壁下译丛》，苏联作家李别金斯基的小说《一周间》。她的读书兴趣开始转向苏联文学和新兴的革命文学理论。

同年4月，丁玲无法忍受与胡也频长期分离的痛苦，也来到了济南。5月，因为胡也频被山东反动政府下令通缉，两人被迫返回上海。

1930年，中国新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在后世文学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组织——左翼作家联盟。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筹划，以鲁迅先生为旗帜的文学团体，丁玲与胡也频回到上海不久，便加入了“左联”。

由于此时丁玲已有身孕，便没有参加“左联”的实际活动，但她却用自己的笔与“左联”保持同一步调。因胡也频把精力主要用在革命活动上，他们的稿费收入明显减少，日子过得很清苦。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即蒋祖麟），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两人只能共吃一份饭。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丁玲的创作获得了大丰收，写下了《潜来客的月夜》、《自杀日记》、《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过年》、《岁暮》、《小火轮上》、《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走后》、《在一个晚上》、《野草》和中篇小说《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等十多篇小说。

丁玲前期的短篇小说，主要描写不幸的妇女形象：有穷学生、小教员、作家、乡下姑娘、热恋中的少女以及任人践踏的娼妓。丁玲通过她们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大革命失败后人们的精神苦闷和病态心理。作品充满凄楚、痛苦、愤懑和挣扎的复杂感情。其中有些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但同时潜伏着不满现实、追求光明的力量。而此时她已逐渐意识到生活天地的狭窄以及立场感情上的限制给她的创作带来的局限性，她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在时代潮流的冲击和革命思想的启迪下，她的创作环境有了新的突破，小说的内容空间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展，可以说是从一个狭窄的小黑屋走进了宽敞光明的大天地。

丁玲在她《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回忆了在“左联”的这段艰苦而奋进的日子：

我们都参加了左联，也频并且在由王学文与冯雪峰负责的另一个暑期补习学校教书。他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这一时期，我们生活过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苦、都严肃……十月革命节的那天，我进了医院。8号那天，雷雨很大，九、十点钟的时候，也频到医院来看我，我看见他两个眼睛红肿，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他说“光明不是在我们的前面吗？”

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他是为同情我而哭呢，还是为幸福而哭呢？我没有问他。总之，他很激动地哭了。可是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晚上他没有告诉我什么，第二天他才告诉我，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他在请求入党。这时我也哭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的脚下，光明来到了。

随着胡也频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多，丁玲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一些革命工作者。然而就在他们相互扶持，共同在革命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时，白色恐怖也逐渐向他们逼近。

1931年1月17日早晨，胡也频告诉丁玲，他要去开左联执委会。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中午，他没有回来，天黑后，外面刮起风来，他还没有回来。一天，两天过去……丁玲十分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她内心痛苦地呼喊：“我要救他，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胡也频被捕后，“左联”和丁玲本人多方营救，终未成功。2月7日，胡也频被国民党残杀在上海龙华荒郊。胡也频被杀害前，丁玲在沈从文的陪同下，曾经给胡也频送过被褥和衣物。隔着两重铁栅门，丁玲看到了正被狱警押解着的胡也频，她不顾一切地大喊：“频！频！我在这里！”

胡也频听到喊声，立刻掉过头来，很快就发现了她。丁玲紧张得连眼泪都忘了流，只把眼睛睁得死大，拼命地盯着眼前的爱人，胡也频刚张嘴想要喊什么，这时却过来一个狱警将他推走了。

这是丁玲最后一次见到胡也频。他们短短几年的相知相守就在随之而来的罪恶的枪声中画上了永久的句号。

年轻的妈妈：

不要担心我，这里的生活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枯燥和痛苦，有许多同志在一道。他们都有着很丰富的生活经验，我天天听他们讲故事，积累了不少素材。我很想拿起笔写些东西，我相信自己还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来。请你多寄些稿纸给我，我要写，我还可记录许多素材寄出去给你。你不要再为我设法了，看这样子，他们不会轻易放我出去。我既不会投降，那么总会有两三年的徒刑。坐两三年的牢，我是不怕的，我还年轻，我也不会让我的青春在牢中白白过去。不过这样就苦了你了。祖麟太小，他现在怎么样了？我很想他，替我亲亲他。你最好把孩子送回湖南，让妈妈照料，这样你的生活可少一些拖累，也可腾出时间用来写作。孩子送走了，自然会寂寞些，但能创作，会感到充实的。你也不要脱离左联，应该靠紧他们，和大家在一起，你就不会感到孤单。你要有勇气，困难是暂时的，会过去的。吻你。

年轻的爸爸

这是胡也频给丁玲的最后一封信，来自爱人的力量使丁玲面对敌人的高压政策，没有丝毫的畏惧。她同沈从文一起将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送回湖南母亲处抚育，在家里待了3天，旋即返回上海。她多次发表演讲，驳斥一些反动小报关于“丁玲终日以泪洗面”的谣言。1931年5月，她到光华大学讲演，题目是《我的自白》。6月，她又去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讲演《死人的意志不在大家身上吗？》。

与胡也频几年的同甘共苦，使丁玲很快走向了革命的道路。烈士的鲜血，更进一步使她坚定起来。她要求到江西苏区完成烈士的遗愿。不久，组织上找丁玲谈话，决定要她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九一八”事变后，丁玲参加了上海反日大同盟的游行示威，还化了装，穿起皮大衣、高跟

鞋，为贴标语的同志放哨。她曾一度上前线参加救护慰劳工作。

12月9日，丁玲与文化界人士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932年1月，她与楼适夷等人参加中国著作者协会，2月3日又同鲁迅、茅盾等43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制造“一·二八”事件。

1932年春天，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下半年开始担任左联的领导职务。

这一时期，由于与广大工农群众接触，丁玲的笔触开始涉及工农群众这个新的阶层，她的视野更加开阔，笔力也更加刚健。主要作品有《田家冲》、《水》、《法网》、《某夜》、《消息》、《夜会》、《诗人亚洛夫》、《奔》等十几个短篇小说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

丁玲在左翼文坛的活跃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丁玲，押往南京，封禁了她的全部著作，并四处散播谣言说“丁玲叛变了”，这激起了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强烈愤慨。鲁迅得知丁玲被捕，非常气愤，当传来丁玲遇害的消息时，他奋笔书写《悼丁君》一诗，感叹：

如磐夜气压重楼，
剪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
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玲并没有遇害。1933年至1936年，丁玲被监禁在南京，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她的心始终向着党，向着人民。尽管经历了逃跑不成、自杀未遂的苦难，她依旧没放下笔，仍然坚持写作。1936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丁玲的《意外集》，其中《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的生活》、《团聚》等短篇小说都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这些作品仍然继承她左联时期的创作风格，描写底层人民的悲苦，抨击社会黑暗。

也是在这一年，丁玲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在党的周密安排下，她终于逃离囚居3年的南京，躲在上海的一间公寓里。就在这时，她收到了宋庆龄援助她的350元钱，这一雪中送炭的援助顿时让她感觉到无比的温暖。

丁玲后来在《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写道：“现在面对着这350元，我的心感到灼热，感到温暖。3年多来，敌人对我制造了许多无耻下流的谣言，用软刀子杀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谣言的影响，也曾怀疑的眼光审视我。这时孙夫人赠我的350元钱，代表的是对我政治上的信任，这比泰山还重，是千万两黄金难买的无价之宝。”

1936年9月，在组织的协助下，她来到了西安。看着祥和美丽的郊野风景，她的心情显得格外舒畅，当车过临潼，进入古长安境内时，她的脑海里出现了若干的联想：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杜甫诗）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诗）

奔向红色的希望

1936年11月1日，丁玲离开西安，奔向红色根据地——保安（现陕西志丹县）。这一长途奔波，完成了她生命里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为她一生的追求和向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丁玲也由此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丁玲到达保安后，红色政权随即召开了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出席了宴会。

此时，丁玲已经产生了上前线的想法。奔赴前线之前，她参与筹备发起了陕北苏区的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她上前线的要求后，丁玲即打点行装，跟着前方总政治部杨尚昆等领导北上定边，参加了广州暴动纪念大会。“西安事变”后，她又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从定边南下，经过甘肃前往三原前方司令部。丁玲以一个女勇士的满腔豪情，在革命的浪潮中勇往直前。

丁玲的工作得到了红军统帅部的肯定和赞扬。1936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丁玲挥笔填词，词名《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丁玲非常怀念这一段战斗的日子，虽然只有短短的10个月，但她却写出了《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入伍》、《成立之前》、《第一次大会》、《政治上的准备》、《工作的准备》、《我们的生活纪律》、《民先与文研》、《河西途中》、《临汾》、《冀村之夜》、《孩子们》、《第一次的欢送会》、《杨伍城》、《忆天山》、《马辉》、《勇气》、《讽刺》、《到前线去》、《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彭德怀速写》等小说、短文、速写、通讯共30多篇，并创作出3幕话剧《河内一郎》。《三八节有感》也是同期的作品。她从关心妇女社会地位出发，就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列举妇女所遇到的各种思想障碍，并提出妇女要获得解放，“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要有健康的身体，进取的精神，思索的习惯和坚持到底的决心。她把从自己半生的经历中所领悟到的真知告诉给广大妇女们：

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在创作喜获丰收的同时，丁玲也收获了爱情，她与她的宣传股长陈明相恋了。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不久，她与陈明喜结良缘。

1942年，丁玲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她连续写了《十八个》、《万队长》、《二十把板斧》（已散佚）等作品。1944年以后，丁玲到边区文协从事报导工作，写了《三日杂记》。后来延安召开边区合作会议，会上，丁玲为丰富的生活素材所驱动，不久，又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田保霖》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请丁玲和欧阳山去吃晚饭。在晚餐桌上，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丁玲与陈明、杨朔等组成一个延安文艺通讯团，步行去东北，沿途丁玲写了《阎日河流种种》、《介绍俘虏学习队》、《躲飞机》等好几篇见闻。后因内战爆发，通讯团滞留在张家口。此时丁玲已经产生了写一个长篇的想法，内容主要是写陕北原本落后的农民，如何在革命的进程中变成新人。在体裁上，她意图借鉴《三国演义》

的章法，让人物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活动。作品刚写了两章，丁玲就感觉难以为继。就在这时，党中央下达了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丁玲顿时感觉找到了新的创作源泉。她和陈明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的土改工作，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工作后，丁玲完成了《桑干河上》的构思。11月初，丁玲开始了辛勤的创作。

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腰疼得非常厉害，只好把火炉砌得高一些，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间，才能入睡。每当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时候，就像火线上的战士冲锋陷阵那样，凭着一种勇敢顽强的精神继续创作下去。1948年6月，《桑干河上》终于完稿了。同年9月，东北的《文艺战线》节选发表了《桑干河上》，接着，东北新华书店出版了单行本。1949年5月，《桑干河上》易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由新华书店在北京出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到了社会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甚至被称做“史诗式的作品”。1952年春，这部作品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当时，身为《人民文学》主编的丁玲，正与曹禺在莫斯科参加世界文化名人果戈理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驰誉世界的名作，被翻译成俄、德、日、波、捷、匈、罗、朝等国文字。当年仲秋，丁玲将所获斯大林文学奖奖金5万卢布全部捐献给了全国妇联儿童福利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回到了北京，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联常委、《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等职务。作为中国作家和中国妇女的一名代表，她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积极奔走。散文《旅欧散记》等作品，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她这一时期的活动和见闻。

虽然工作很忙，但在这一时期，她仍然写了一批数量颇为可观的评论、杂文，大多收在《跨到新的时代中来》和《到群众中去落户》两个集子中。

丁玲身居高位，重任压肩，每年仍尽量到农村生活一段时间，或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这样她写下了一些优美的散文，如《粮秣主任》（1953年）、《记游桃花坪》（1954年）等。这些作品更加注重挖掘人的内心和人的命运，文章感情炽热，艺术手法精巧细腻。

三分之一的黑色低谷

就在丁玲的人生达到她辉煌的顶点时，危机也在像蛇一样逼近她。自1953年开始，文联内部就有人说丁玲与《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搞小集团。随后，丁玲成为中国作协的批判目标。1955年，她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头目。1957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出长篇文章，标题赫然写着：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时，丁玲又被定为大右派。她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连同在延安写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写的《粮秣主任》、《记游桃花坪》，一并成为反党大毒草，她被开除党籍，等待她的是下放北大荒、蹲大狱、遣送山西农村长达20多年的磨难生涯。

从1958年到1970年，丁玲夫妇戴着“右派”帽子，在北大荒生活了12年。他们先是在汤原住了8年。1965年，又转到宝泉岭农场。其间，丁玲养鸡、养猪、种菜、锄草、扫盲，搞家属工作，她干什么干得很出色。丁玲夫妇是以普通农工的身份参加劳动的——不，确

切地说，他们甚至不能奢望被视为普通农工。他们是戴着帽子的大右派，是脸上刺字的流囚！有时她走进公共场合，就有人围上来，大喊：“大右派！大右派！”甚至有步行几十里路专程来看新鲜的，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丁玲不敢抬头，她深深体会到，她与人民群众之间人为的厚障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想像，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

类似这样的事件还很多。依照一再强化的阶级斗争观点，造反派们一次又一次地变着法地“批斗”丁玲夫妇。造反派们要开批斗大会，纸帽子糊得又高又大，有一顶本来准备给一个参加过国民党的人戴的，那人跑了，帽子总不能空着。他们一下就想到了丁玲——现成放着的大右派，就给她戴上了。

由于造反派内部的争斗，他们分成两派，每到夜幕降临时，就轮流着来“批斗”丁玲夫妇。门被撞开了，戴着红袖标的人一下子全闯进来，大呼大叫道：“起来起来，站到地下，背段毛主席语录！”另外一些人就翻箱倒柜，搜查“反革命”材料，看到喜欢的物品，顺手扔到窗外，外面有人接着。监督丁玲背语录的人，凶神一般站在她的身旁，听到有一字背错，手中的皮带就挥舞起来……

但即使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丁玲依旧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杜晚香》中的主人公，就是丁玲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丁玲将对她的了解和感情写成一篇散文，小心地珍藏在帆布箱子里，坚信自己在世时，或在后代人的手里总有与读者见面的机会。

在痛苦的日子里，丁玲、陈明夫妇始终坚持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共同走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

丁玲也始终没有放下她最钟爱的文学创作。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丁玲已写了 10 万字的生活记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及若干短篇共十几万字也完成了。可惜在浩劫中，它们都荡然无存。

1966 年，空前的灾难席卷了全国，一个普通人尚难幸免，更何况丁玲。对她的批斗和折磨步步升级，暗斗、单独斗、住牛棚、无数次的抄家……她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摧残，经济生活的极端困顿，也没能把她压倒，她像一株“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寒梅，傲立雪中。

“文化大革命”中，丁玲、陈明都进了牛棚，两人连互相凝视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了。为了给丁玲送去力量，陈明常乘看守人不注意的空隙，给丁玲扔去揉得皱巴巴的纸团，或是一个破火柴盒，一张枯干的苞米叶子，上面写满了只有丁玲才能认得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些用特殊材料写成的“情书”，是丁玲生命的甘泉。她常常偷偷地拿出来抚摸，低低吟诵，陈明那些深情和有力的话语，在她寒冷的心中点燃了生之火把。

永远不祈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人要关怀你的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万珍重。

——陈明致丁玲

这些奇特的书简，可集以成册、成书，可惜丁玲被戴上手铐那天，当她在被脱光衣服搜身的时候，这些珍贵的财产都被当做废纸毁弃了。她苦苦哀求人们留下它们，但怎么也感动不了那些铁石心肠的人。

1970 年 3 月，丁玲被秘密逮捕，押回北京。1971 年 4 月，这位中国新文学的杰出女作家开始了孤寂的铁窗生活。她和陈明被分别关进北京附近的一所监狱。完全与世隔绝，一个月放一次风，没有笔也没有纸，什么东西也写不成。她痛苦极了：

孤寂，无穷无尽的孤寂，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尝过这种孤寂的滋味。

在狱中，她有过不知多少次天真的梦幻，盼望有一天，会有好心的看守员对她表示同情，替她送来一张陈明的条子。她一天天等待着，盼了 1700 个日夜，希望一次次升起又一次次幻灭，仿佛火花在黑夜的空中忽明忽暗。就这样她熬过了漫长的 5 年。

1975 年 5 月，丁玲夫妇获释了，被秘密送往山西长治滴谷寺下的漳头村“安家落户”。1979 年，丁玲迎来了她人生新的转折点。年初，经中组部批准，丁玲从山西漳头村返回北京治病。同年 5 月，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作出了《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撤销 1975 年 5 月 19 日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同时，也恢复了丁玲的党籍。这一年，丁玲先后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五次会议以及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常委，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1984 年 8 月，中组部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发了一个 9 号文件，即《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至此，这一占据了丁玲生命旅程三分之一长的冤案史终于得到了彻底的纠正。

平反之后，丁玲的一系列作品得到了发表，其中《“牛棚”小品》发表在《十月》杂志，《杜晚香》则发表在《人民文学》上。1983 年 7 月，在《十月》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牛棚”小品》被评选为优秀作品。

丁玲终于回归到了一个作家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多年的磨难使她对人生、对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令人安慰的是历史给了她对于生命、对于创作的那份执著精神最好的答卷，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冤案得以平反，而且她的创作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最后的旅程

这个有着坎坷曲折人生路的女作家是多病多灾的。1985 年 7 月 13 日，丁玲为了治疗日益严重的糖尿病、肾病住进了医院，整整两个月才出院。这期间，她曾回家一趟，为的是观看电视剧《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试映。丁玲在给该剧编导们的一封信中写道：

莎菲如果活到了今天，该是一个 58 岁的老妇人了。她曾获得老人的同情，但也受到一些误解和辱骂。以莎菲对黑暗社会的彻底反叛和对光明希望的执著追求，我想，莎菲不会“悄悄地死去”。她不仅没有死去，而且从彷徨中走出了黑暗，找到了光明。

后来，丁玲病情恶化。勉强支撑到 10 月 8 日，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起来。就在顽强与病魔搏斗中，丁玲迎来了她的 81 岁生日，这是她的最后一个生日。她再没能走出医院。

1986 年 2 月 8 日，除夕之时，陈明带着孙女守在病房，他怕丁玲在年关伤感，便写了一封信安慰她，并让孙女念给她听：

此刻，我们全家人心都贴在你的心上，同你一起，和往年一样，欢迎新春来临……你能关心自己便是对我们大家的最好的关心和最大的安慰……这封信我不多写了，你听了之后笑一笑，我便懂得了许许多多……

丁玲真的笑了，那是与陈明心灵相通的会心的微笑。然后，她吃力地用手捉住笔，颤抖着在信末写下这么几个字：

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

这是丁玲最后一次在纸上书写文字。

大年初四那天，丁玲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周围人说：“昨天、今天我总做梦，刚才梦见有两段鱼，我一招呼，这两段鱼合成了一条，就是我和爷爷（指陈明）。”说罢，又沉沉睡去，笑容却留在嘴角……

此后，丁玲一直处于昏迷之中。14日忽然清醒过来，她低缓地对陈明说：“死，原来也这样难。”这话令陈明无比心痛。

周围的人意识到丁玲的异样，叫来了医生，在被推上手术台时，丁玲忽然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望向陈明。陈明注意到她的嘴唇在微微翕动，便偏过头去，将耳朵贴近她的嘴……他清楚地听见三个字：

“吻吻我。”

说完这句话，丁玲便与世长辞了。

对丁玲的逝世，许多国外知名人士都极为关注，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驻华使馆及作家协会，还有许多外国友人，都发来了唁函，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法国作家苏珊娜·贝尔娜的唁函是：“她永远在那里！”

是的，丁玲不会离开，她永远在人民的心里。这位中国20世纪的伟大女作家，看惯了历史的烟云，走过了曲折艰辛的人生路，品味了生命中太多的悲欢离合。她说自己会成佛，那只是在告诉我们和她自己：那么真实的人生，她曾经一路欢笑着走过。

冰雪之质清婉流年——冰心

冰心（1900—1999），福建长乐人，原名谢婉莹。1911年冰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1914年就读于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五四”时期，在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就读，后转文学系学习，曾被选为学生会文书，投身学生爱国运动。1921年参加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出版了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等。1923年赴美留学，专事文学研究。曾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举世为之瞩目，至今仍然声誉不衰。抗战胜利后到日本，1949—1951年曾在东京大学新中国文学系执教。1951年回国后，除继续致力于创作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天伦之乐

1900年10月5日，福建省福州城内隆普营的谢家大院内，一个小生命诞生了。这所大院，冰心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